論　著

「不可理喻」的力量——反思抗戰農村婦女工作中的理性人預設*

汪　正　晟**

摘　要

本文以抗戰時期的浙西昌化縣婦女訓練工作為例，反思現代政治的理性人預設。按照當時智識女性的一般論述，推動農村婦女工作，首要是將婦女從半封建社會中解放。實務上卻是效果不彰，阻礙重重。何以如此？其中因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以及編輯委員會悉心審閱並賜予寶貴意見，衷心感謝。
收稿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素自非只一端。然而城市智識女性對農村婦女缺乏瞭解，將其視為落後與不理性，未能掌握其真實的動能與需求，蓋為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從分析昌化縣婦女工作的案例可知，農村婦女有其自身獨特的社會性別與地位認同，昌化縣當局不僅承認更是大加倚重，從而取得了明顯的工作成效。婦女解放論述在中國農村婦女工作上失靈，是否意謂著它的普適性仍有待證明？本文試圖提出：在世界政治史上，解放論述背後的現代政治理性（男）人預設，與婦女的「非理性」之間，何者更具有普遍性與合理性，仍是今日值得探討的課題。

關鍵詞：智識婦女、農村婦女、解放、理性人、非理性

前言

近年來，婦女性別史學者在探討中華婦女的主體性之際，普遍意識到：婦女在傳統文化體制中，仍保有實現自身意志的可觀能力。例如，施霞研究慈善事業中的官夫人作用，指出：較之現代女性，傳統上層婦女往往更能動員社會資源，展現出明確的主體性。[1] 然而，主體性概念的應用，也可能預設了西方中產階級的女性意識，而將個體自由與解放視爲普遍的人（女）性追求。[2] 換言之，自由與解放的具

1 Xia Shi, *At Home in the World: Women and Char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桂華對於主體性問題有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見桂華，〈「他者」眼光下的中國——評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文化縱橫》，

體策略容或隨文化情境有所差異，然其行動背後以擴大個體選擇自由爲宗旨的解放理性(emancipating reason)則無二致。[3] 研究者往往對於婦女個人權利的增減辨析入微，對於無涉自我實現的道德價值需求與行動則不免措意較少，以致焦點更多集中於父權體制中少數特殊女性經驗，再以之反推一般婦女在日常情境中的處境，其結果不免將中華婦女與其身處的社會文化傳奇化，從而減損了經由婦女透入歷史中國肌理的優勢。以外來的人性論述考察史實，尤其抵消了以婦女性別觀點衝決現代性霸權框架的力道，使得中華婦女的歷史仍舊停留在充當西方「普遍」歷史奇異對照的地位，未能眞正發揮其重寫世界史的潛力。有鑒於此，本文以抗戰農村婦女工作爲範圍，試圖指出那些見識經歷似無足可稱的農村婦女，如何以她們平凡處境中擁有的能力與資源，擔當了歷史的眞正主角。

關於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例如，游鑑明在討論近代中國婦女運動整體趨勢與特點的論文中，指出以國府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爲主體的戰時婦女組織，確實在救濟難民、募集物資與喚起婦女參加抗戰方面有相當建樹，卻也體現晚清以來的婦女論述中，婦女動員工作與爭取婦權運動之間的持續張力。[4] 董慧則高度肯定

期 6（2014 年 12 月），頁 104-109。

3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Modernity, Religion,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 trans. by 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pp. 14-16.

4 游鑑明，〈交錯在動員與運動間的中國婦運〉，《婦研縱橫》，期 95（2011 年 10 月），頁 6-18。在游鑑明的論述框架下，宋青紅從制度與政策思路切入，對個別婦女組織進行實證研究。見宋青紅，〈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婦女部之設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

國民黨戰時婦女工作對女性主體意識的發揚。[5] 李丹柯根據口述訪談，呈現了重慶週邊的婦女，特別是女學生的烽火歲月。[6] 柯惠鈴對於戰時江西農村婦女工作的研究，與本文尤爲相關。該文從知識女青年下鄉工作者的視野出發，不僅詳盡探討了江西農村婦女工作的過程與具體問題，也對婦女工作者自身的觀點經驗頗多闡述。[7] 以上研究無疑有助於吾人理解戰時婦女運動或工作，在以男性政治活動爲主的歷史敘述中，補充被忽略的婦女性別面向。但也因爲其研究對象主要是智識階層女性，較少論及廣大底層農村婦女。此外，爲了強調歷史中的性別因素，這些研究幾乎完全聚焦於婦女工作本身，而爲進一步探究性別視野的政治史脈絡與重要性留下較多的空間。本文即在揭示普通農村婦女在歷史中的能動性，從而說明：抗戰農村婦女工作不僅牽涉性別，更可以藉此考察婦女性別論述與政治實踐的交互關係，審視現代政治概念框架及其人性基礎的合理性。

本文採取將農村婦女工作置放於中國現代政治史脈絡的視角來對話上述研究，選擇了考察抗戰時期國民黨區域內的婦女工作，並聚焦於浙江省的案例。理由是國民黨區域大體依循類似的婦工政策思路，其中浙江左傾或「進步」人士的言論與活動比較活躍，突顯出此種意識型態具有的共生性

（2017 年 6 月），頁 105-156。

5 董慧，〈抗戰動員視野下女性主體意識的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6 參考 Danke Li（李丹柯）,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p. x, 215.

7 柯惠鈴，〈抗戰初期的知識女青年下鄉——以江西為例的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33-73。

與共時性，從而開啓在黨派因素之外的另一種解釋。本文首先概述當時關於農村婦女工作較爲普遍的觀點，並梳理由智識婦女轉向農村婦女過程中的性別與政治論述。最後分析浙西昌化婦女工作的個案，指出農村婦女在地方行政中的關鍵作用。

一、婦女解放論述的困境

抗戰爆發後不久，動員婦女的議題，即進入公眾的視野。在鼓吹婦女工作的眾多群體中，擁有現代教育背景的智識婦女，顯得格外活躍。這些智識婦女僅佔全中國女性人口的極小部分，但憑藉行動能力與女性身分，她們很快主導了戰時婦女工作的論述走向，儼然成爲其他農村姊妹理所當然的代言人與指導者。

戰爭伊始，大多數婦女工作者都將注意力放在增強民族持久抗戰的力量。中國人口數量固然龐大，但受制於落後的經濟與政府能力，能夠用於戰爭的人力資源實際上極不充裕。婦女居人口半數，如能承擔許多戰時勤務，人力緊缺的壓力既可大爲紓緩，還可釋放出更多青壯男子的戰鬥力與勞動力。基於此一思路，最初婦女工作與訓練內容基本不離戰爭支援。以教育部印發的《戰時的婦女》手冊爲例，即以「加緊生產工作」、「捐輸金錢飾物」、「努力募集捐款」、「慰勞殺敵將士」、「學習戰時常識」、「參加軍隊服務」、「從事救濟事業」、「其他後方工作」等項目劃定了婦女工作的

大致範圍。[8] 以婦女直接投身戰爭支持，乃至戰鬥勤務的構想，充分展示了抗戰初期智識婦女救國不讓鬚眉的熱情與理想。絕大部分實際從事上列工作的女性，也確實來自智識階層，並成爲領導幹部。

然而上述這些戰時工作，其實已非大多數智識婦女所能應付。根本的問題在於：婦女支持戰爭工作的成效，取決於能否以國家行政力量動員廣大的農村婦女。倘若僅僅依靠個別城市具奉獻精神的智識婦女奔走呼籲，卻未獲多數農村婦女的響應，終歸難以爲繼，無補大局。也因此，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後，如何組訓農村婦女就成爲新的焦點，工作重心亦隨之由臨時性的群眾運動，轉爲配合政府推行經常業務。在開展農村婦女工作的過程中，針對實際業務的討論雖然明顯增加，但言論調性整體上卻似乎轉爲激昂，解放女性的呼聲，幾乎成了討論農村婦女工作的主旋律。一時之間，帶有濃厚啓蒙意味的婦女解放論述，竟似壓倒了人不分男女老幼的民族救亡號召。不少婦女工作者認定，只有先推動婦女解放運動，使農村婦女普遍覺醒，不再對「半封建」社會的種種壓迫逆來順受，進而主動掙脫父權與家庭的宰制，才有可能動員農村婦女投身抗日救亡的事業。據此，婦女解放即使不是民族解放的前提，也與之互爲表裡密不可分。〈抗戰以來的婦運檢討〉一文開宗明義的指出：

8 教育部民眾讀物編審委員，《戰時的婦女》（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1938）。

> 當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之下的時候，婦女解放運動就必然的與民族解放運動連結成為一片。這已不再是書本上的理論而已……。[9]

此文還以大部分農婦對智識婦女工作者穿著男性軍裝大驚小怪爲例，說明前者的閉塞保守，並由此認爲，戰時婦女工作「最大的缺點」，就是未能使農村婦女理解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之間的關係。

出現此一激進化轉向，當與智識婦工人員的親身經歷有關。許多婦工發現，動員農村婦女的困難，不僅在於後者缺乏國家民族意識，認爲抗戰事不關己；她們所處家庭與社會環境的觀念風氣，根本就反對女性參與任何傳統性別角色以外的活動。以婦女解放運動開展婦女工作的想法由是萌生。

進一步分析此類言論思路，還會發現智識婦女將解放婦女提上議程，其中固然有應對現實問題的成分，但也不能忽略既有觀念的影響。從當時對婦女工作的一些反省與批評可知，此時婦工人員多半以城鎮中的婦女與學生爲主要動員對象；即使下鄉，也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巡迴宣講，很少在一個地區長期深耕。由於很少與農村婦女深入往來，相當一部分婦工幹部是透過文藝作品與零星見聞，萌生對農村婦女「苦難」的想像與同情。在智識婦女的腦海中，貧弱愚私的農村婦女，宛如一群聽天由命的奴隸，只知默默忍受公婆丈夫虐待壓榨，全無改善自身處境的想法與能力。也因此，只有接受外界的啓蒙解放，她們才能脫離苦海。由是，智識婦女確認了自身作爲所有婦女代言人與解放者的正當性，並將打倒

9 家平，〈抗戰以來的婦運檢討〉，《浙江婦女》，卷 6 期 1（1942 年 1 月），頁 21。

半封建壓迫的解放論述與實踐，確立爲婦女工作的主軸。就此而言，農村婦女作爲想像中受壓迫的他者，成爲智識婦女用以對照自我新女性身分認同的鏡像，而婦女工作恰好作爲投射此一自身形象的布幕。

因此，解放論述所反映的，大體上是某些智識婦女自身的政治訴求，其中已然預設了對農村婦女現有生活與價值的不認同。對婦女家務價值的極度輕蔑，是其中一個鮮明表現。一位已婚智識婦女如此寫道：

> 久住在窮鄉僻野整天消磨在燒飯洗衣領孩子的瑣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工作中的我，讀了王坪先生的「婦女俱樂部計畫草案」以後，好像在靜寂的黑夜裡夢見了婦女的天國，……婦女是天生的家庭奴隸嗎？婦女是天生不會管理國家大事嗎？不，絕不，我堅決的相信，許多婦女之所以還沒有參加集體的社會活動和抗建的工作，尚迷戀在家庭的牢籠而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完全是因為社會對她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重重封鎖……。[10]

從她下文所提出的建議來看，作者嚮往不已的「婦女俱樂部」，其實是一個推行婦女工作的準行政機關，其架構與運作邏輯皆與由男性組成的行政機構並無二致。可在這位雖然僻處窮鄉，但可能有公務員相關背景的智識婦女價值觀中，置身「婦女俱樂部」中，如同男子一般「管理國家大事」，哪怕只是設想一下，也令人心搖神馳。相較於在「瑣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的家庭生活中做「行屍走肉」，就是等因奉

10 楊漪清，〈對於「婦女俱樂部計畫草案」的一點建議〉，《浙江婦女》，卷 3 期 3／4（1940 年 11 月），頁 26。

此的官僚組織也宛如天堂。諸如此類十分輕鄙相夫教子等家庭勞務，欣羨男性事業的心理，似乎不難在智識婦女的自我認知中發現。可以說，藉由以男性行爲準則定義公共領域及其公共性，女性的一切作爲遂失去公共意義，自然淪爲私領域內缺乏政治作用的小事。惟有從女性化的私領域中解脫，以啓蒙男性(enlightened man)的姿態進入公共的政治領域，才是婦女的出路。當此種男性化的政治訴求，成爲評斷其他階層婦女能力貢獻的標準，就不免建構出一套以智識婦女爲頂點，以農村婦女爲底層的婦女工作分工等級。由黎芳雨〈戰時婦女工作之我見〉一文，可見其基本輪廓與原則：

> ……智識婦女——這一部分婦女是包含女學生、女教師、女職員、女公務員及大公司裡的女店員等。她們因為文化水準比較高些，對於政治的敏感性，也在一般婦女之上，部分因為平日生活，比較優裕，所以艱苦的工作，難能勝任。這一類婦女應該加強其政治的認識，然後可以動員她們去教育群眾，喚醒落後的婦女來。這一類工作是非常需要的。今日的智識婦女應該擔任這項工作。……家庭婦女——這是指中上層家庭中的典型的賢妻良母而言，……對於這一類婦女務須動員她們募集寒衣、縫製寒衣，撫養難民，或進行獻金運動、節約運動等，……女工——女工因為她們的生活，比較艱苦，所以她們的決心和毅力都比較大。她們能夠擔任比較艱巨的工作，但是必先予以訓練和加以組織。……農村婦女——農村婦女在數目上，雖然是比較的多，但是多半因為沒有受過教育，因此對於政治瞭解的不多，而且工作能力，當然薄

> 弱，所以最初只能擔任比較輕鬆而簡易的工作，如洗衣、煮飯、運輸等，以後當然也可以擔任各種比較重要的工作。[11]

黎芳雨爲智識婦女所下的定義，頗能反映這一群體的時代特色：女學生作爲智識婦女之首，位列女教師、女職員之前，「大公司裡的女店員」居末。這一排序不僅是根據作者所謂的「文化水準」，且頗有奧妙。首先，純就學歷論，眾所週知，當時大學生比例極低（不到萬分之一）。[12] 即使特指鳳毛麟角的女大學生，女學生也未必勝過教師、職員、公務員，因爲公教人員中也有大學學歷，更何況當時絕大多數女學生屬於小學、初中程度。另一方面，作者特別將「大公司裡的女店員」列入智識婦女。雖說在以文盲爲主的女性人口中，這一群體已屬粗通文墨，但若比較小店鋪的女店員與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村地主女兒，前者的教育優勢可能未必明顯，甚至有所不如。這些跡象透露的消息是：文化水準，即智識，不全然取決於教育程度，也與生活與政治等場域(field)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慣習(habitus)密不可分。[13] 那些

11 黎芳雨，〈戰時婦女工作之我見〉，《廣東婦女》，卷 3 期 5／6 期（1942 年 1 月），頁 11。

12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爆發前全國人口約 5 億餘。以民國 25 學年度為例，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的統計，在校大學生數為 37,255 名，其中男女比約 6 比 1。該學年度大學畢業生計 7,951 人。見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編 14，「教育統計」，表 16-17，頁 1374-1376。

13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Omar Lizado, "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Bourdieu's Habitu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4:4 (December 2004), pp. 375-401.

讀過三百千千、《幼學瓊林》的鄉村女子，所以不在智識婦女之列，乃是因爲她們缺乏某種生活作風與政治行爲。而女學生與公司女店員所以分列智識婦女序列的首尾，則是兩者掌握慣習程度的反映。一言以蔽之，智識就是一個在都市資產階級生活與政治場域中流行的慣習，它指涉一整套區隔人物高下的合宜生活與政治作風，即所謂「政治的敏感性」。城市中的女學生最有能力與時間學習表達城市政治慣習，於是佔據了政治話語上的制高點。城市生活的習染優渥，無形中已然等同爲文化政治資本。

在黎芳雨等婦女工作者心目中，此種政治慣習思維的進步與正確「不證自明」。婦女工作也相應的將主要資源挹注到城市，用於動員以女學生爲主的智識婦女。[14] 眞正需要大量投入的農村婦女工作，反而得不到充分的人力物力支持，反過來又增強智識婦女重城市輕鄉村的既有印象，致使工作重心進一步向城市傾斜。

黎芳雨對家庭婦女的定義，可說亦反映了某種單身智識女性的「性別」優越。她把家庭婦女特指「中上層家庭中的典型的賢妻良母」，其中不少人無疑屬於智識婦女。清末民初以來，「賢妻良母」，甚至「典型的賢妻良母」等詞，早已不全然是正面意義，30、40 年代尤甚，有時差不多等同有待解放的家庭奴隸。[15] 黎芳雨還將之特別指涉「中上層家庭」，這類缺乏覺悟的「智識」婦女，只能被動員做家事相

14 羅鎮歐，〈民眾自衛與婦女訓練（續）〉，《新政週刊》（廣東），卷 1 期 28（1938 年 7 月），頁 14。

15 例如袁雪芬，〈賢妻良母〉，《社會日報》（上海），1945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阿 Q，〈賢妻良母〉，《福爾摩斯》（上海），1935 年 6 月 13 日，第 2 版。

關與捐錢等任務，很難不令人疑心帶有嘲諷或者鄙薄官夫人、富太太的意思。[16] 此類敍述其實頻繁出現在智識婦女的言論中，並不是黎芳雨一人的特殊觀點，類似言論又如：

> 佔著不小數目的家庭婦女、太太、小姐、少奶奶們，迷信、封建、苟安、虛榮和頹廢的愛情，這些毒蟲咬著她們，使她們較難感動……。[17]

從政治敏感性的角度，智識婦女再次凸顯了其他女性「較難感動」的遲鈍。在批判權勢階層腐敗之際，也貶抑了上層婦女調動資源的能耐。以婦女解放爲主的工作路線，客觀上起到限制已婚智識婦女權力的作用。潛在的有力競爭者安置在賢妻良母專屬的慈善事業中，單身智識女性順理成章的擔起了領導婦女工作的重責大任。

依照同樣的邏輯，黎芳雨將缺乏「智識」此一慣習的女工與農村婦女，也定性爲適合打雜的勞力者，洗衣煮飯運輸等體力勞動被理所當然的視爲輕鬆簡易的工作，分配給農村婦女。農村婦女確實受教育的不多，按照各人才性之區別而分配勞心勞力的工作亦有一定道理。然而，這種設定畢竟使覺醒的農村婦女在義無反顧的走出家庭、投身社會之後，仍然陷入了煮飯、洗衣等「瑣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工作」的迴圈，在文化水準優越的城市姊妹心目中也難以獲得眞正的尊重。原本封建社會的底層地位與家務的束縛似乎沒有明顯的改變，這種不符合平等自由等解放理想的境遇很難鼓舞人

16 當時官夫人富太太從事此類活動甚多，無煩枚舉，略舉一例以明之，〈婦女獻金運動〉，《立報》（上海），1937 年 9 月 29 日，第 5 版。

17 夏英喆，〈抗戰以來婦女工作之檢討〉，《時事類編》特刊（重慶），期 30（1939 年 1 月），頁 59。

心，容易引發作者以地區、貧富、教育、職業等因素（其實是女性嚮往的男性形象）歧視女性的觀感。幸而黎芳雨在文末表態，農村婦女「以後當然也可以擔任各種比較重要的工作」，不排除她們擔當重任的可能性。這多多少少減輕了一些疑慮。

在黎芳雨等智識女性看來，不論有無讀書識字，農村婦女「工作能力，當然薄弱」的關鍵在於「文化」水準不高，「政治」教育落後。這種以政治工作能力取決於某種特定場域文化條件的思維，首先體現了整個婦女解放論述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所有婦女，無論其成長的社會文化背景，皆被視作本質上具有與進步女性一樣的主體意識，只要經過適當的啓迪與釋放，就能轉化爲追求啓蒙式政治自我實現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面，既然進步的主體意識實際上來自特殊階層的慣習，因此也由少數出身特殊的智識女性所壟斷，並在這個號稱普遍的人性假設上，架起了整個按照性別歧視分工的層級。智識婦女，尤其是高學歷單身職業婦女，隔著一層人人平等的精巧話語羅織，安坐於文化霸權的頂層高位上，爲下方廣大的農村婦女所仰望忻慕。

這套婦女解放論述的意識型態基底，源自現代理性人與男性性別價值，本質上與其所標榜的平等與多元價值並不契合，這導致它的服膺者對於傳統、鄉村，主要是負面與貧乏的想像，鮮少能有眞切與同情的認識。此一論述框架不但貶低了農村婦女的作用，更輕率的排除家庭作爲政治工作一個重要場域的可能，因此也無法理性的評估廣大農村婦女拋夫別子的期待與現實的距離。所以在城市宣傳進行得如火如荼，但落實到鄉村的婦女工作時，即遭到現實無情的打擊。

當智識婦女幹部以解放者姿態駕臨農村，準備「對一般守舊分子……普遍的展開理論和行動的駁斥，予以無情的打擊」時，[18] 卻並未看到那些仰祈她們救贖的可憐「同胞」。即使好不容易靠著地方行政官員的面子與威勢，使所謂守舊分子在「打擊」前讓步，終有機會向農村姊妹宣揚苦難的社會根源與平等自主的福音，大部分村姑農婦也未感到義憤塡膺或歡欣鼓舞。有些比較敏感的智識婦工幹部驚覺，往往是農村婦女刻意躲在「半封建」社會的壁壘後，向所謂解放者投來相當不以爲然的眼神。也因爲如此，農村婦女工作，並沒有因爲解放論述的提出而順利推行，反而陷於更加被動的局面。一位辦理農村婦女識字班的工作人員如此描述了所面對的困難：

> 最困難的就是跑進了人家家裡要和人家講話，……不知從那裡說起，……只好說了……婦識班的重要和好處，後來又談了一些現在抗戰情形和婦女怎樣被壓迫，現在怎樣來求解放，以及婦女在抗戰過程中的責任，盡我們知道的略為解說給她們聽。可是多數人恐怕騙她們去操……（抽壯丁）……都不敢來，即使有願來的，又不能得舊禮教和封建思想的許可。……不斷的奔了四五日，……只有使人灰心。[19]

農村婦女缺乏國家民族觀念，害怕當娘子軍，固然是工作不順利的客觀因素，然而當著對象的家人面前大談婦女被壓迫

18 家平，〈抗戰以來的婦運檢討〉，《浙江婦女》，卷 6 期 1（1942 年 1 月），頁 21。

19 宋照連，〈辦理婦女識字班的始末〉，《政工生活》（浙江），期 34／35（1939 年 9 月），頁 45-46。

與求解放，實在難稱通情達理。作者自言屢遭挫敗，也就不令人意外。

一些婦工人員受到認識框架與慣習的限制，不但難以實事求是，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各種弱點。她們自己也有所反省：[20]

> 一般中上層的婦女本身缺乏艱苦奮鬥的精神，對於一種較為繁重的工作即委身不前。有的以工作作為獻身機關團體的敲門磚，藉以結識大人先生，過起享樂的生活。有的大唱高調，要人如此如彼，而自己則塗脂抹粉，言語和行動背道而馳……。

具有階級視角與實務經驗的政治工作者，對智識婦女的批評就更不留情了：

> 上層方面〔按：指智識婦女〕……對工作意氣很濃厚，……對工作立場不夠堅定，單憑感情沒有理智……只有一時的工作熱情，而沒有持久的工作毅力，最後一點是由她們本身階層的決定，他們還不夠瞭解婦女怎樣來解除自身的痛苦與壓迫，怎麼在抗戰中來擔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所〔以〕問題的焦點，還在於他們過慣了舒適的生活，直接沒有嘗到什麼壓迫與苦頭，所以對工作自暴自棄，苟安心理在他們之間，還是活躍著。[21]

20 家平，〈抗戰以來的婦運檢討〉，《浙江婦女》，卷 6 期 1（1942 年 1 月），頁 21。

21 衛，〈怎樣來開展梁弄的婦女——工作報告〉，《政工生活》（浙江），期 33（1939 年 8 月），頁 12。

工作與生活作風還可以說只是個人素質的問題，尚可在工作過程中逐步改進；但由於認識框架而造成的路線錯誤，就沒有那麼容易糾正了。智識婦女基本上認定農村婦女的無知無能，是因爲缺乏現代女性應具備的品質與條件；婦女解放的主要路徑和內容，就是摧破封建社會的牢籠，打通啓蒙思潮傳播的管道，然後替這些村婦補足她們欠缺的現代國家女權意識與能力；也就是說，智識婦女假定，只要提供充分的「智識」，農村婦女的落後狀態就會自然終結。此一思路反映的是智識婦女對自身優勢的一套個人主義式的詮釋，也就是淡化「智識」的社會階級性，而強調個人累積智識的能力。智識婦女因此熱衷於提供與促進智識的流通，也就是宣傳。一旦遭遇困難，其意識型態與生活經驗，也使她們傾向歸因於宣傳不足。這種宣傳至上的工作路線逐漸與現實脫節：

> 許多時候我們太注重宣傳了，……我們常常只做到鼓動群眾，沒有切實教育、組織群眾，沒有把群眾熱情變成力量。大都市、交通要塞的地方，壁報、標語宣傳隊，常密集擁擠，而離火線幾百里和偏遠鄉鎮，便一直沒有人過問。[22]

從此可見，智識婦女雖然自命爲婦女工作的主將，然而她們實際擁有的認識與執行能力，雖然比起非智識階層的平均水準好些，卻遠未達到她們自我期許的程度。甚至可以說，從政治實務的角度來看，相對於好生意氣，不能持之以恆奮鬥的上層婦女，家庭婦女與農村婦女，反而具有更強的政治能力。舉例而言：

22 夏英喆，〈抗戰以來婦女工作之檢討〉，《時事類編》特刊（重慶），期 30（1939 年 1 月），頁 58。

> 中層方面在梁弄〔按：浙江省餘姚縣梁弄鎮〕特多的是受過三四年教育的婦女。不用說，他的頭腦是很純潔的，可惜，他們都關在家庭裡，整個的時間家庭雜務的佔據下。……另一方面……他們還存著一個優異的特點，他們潛伏著還未開拓過的偉大力量，在工作上她們比一般舒適慣了的智識婦女來得忠實，來得刻苦。……在她們覺醒的過程中，能進一步的瞭解本身受二重的壓迫是由於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而不是命運註定的……。[23]

所謂受過三四年教育的中層婦女，應該來自農村中少數殷實的家庭，她們能在私塾或初小讀上幾年書，擺脫目不識丁的處境。就受教時間論，這些農村中層婦女當然不如受過完整新式教育的女性高級知識分子，與高中或師範學歷的女性教員相比，亦有不小的差距。但較之其他只有初中或小學程度，只因掌握城市慣習而被視爲智識婦女的女學生或女店員，農村中層婦女的文化資本並不會遜色多少。如果考慮到教育內容與個人悟性，一個資賦聰穎的士紳家庭的女兒，完全可能在四年內嫻熟古典文字的運用，而成爲農村社會中受人尊敬，說話有一定份量的閨秀，其在地方上能發揮的影響力，恐怕大大勝過新式小學畢業的城市邊緣智識女性。至此可以清楚看到，前述智識婦女根據自身慣習而劃分出的性別「品級」，其實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別不適合作爲推動農村婦女工作的認知框架。

智識婦女往往熟練運用社會主義的分析方法與語言，諸

23 衛，〈怎樣來開展梁弄的婦女——工作報告〉，《政工生活》（浙江），期 33（1939 年 8 月），頁 13。

如階級、剝削、壓迫，也使其婦女工作看來帶有左傾政治運動的色彩。無可否認，婦女解放論述的支持者中，主觀上認同社會主義政治議程的確實不在少數。中共的婦女動員儘管經常與地方現實與軍政目標妥協，但解放婦女論述爲其成功提供了幹部與實踐資源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並不意味大多數智識婦女就是知行合一的社會主義者，具體分析她們的言行就會發現，社會主義的觀念辭彙，已然成爲資產階級智識婦女認同與文化資本不可或缺的風格要素。換言之，具有社會主義的風格要素，是一種慣習的展示，並不必然導致正視底層婦女力量的政治實踐。

有了以上認識，再來看戰時農村婦女工作的發展走向，就不會對下文將要揭示的歷史現象感到詫異。本文討論的個案將顯示：恰恰是從那些對解放論述有所保留的群體中，率先產生一批發掘農村婦女潛能的眞正實踐者。如同〈縣婦女工作與地方政治〉的作者所指出：

> ……婦女工作不僅是協助政令推行的點滴技術工作，而在實際上又往往作為行政上的開路先鋒。最明顯的如推行兵役運動，如果婦女不瞭解兵役的重要，必然會發生家庭牽制的現象，而影響壯丁作戰精神，使壯丁因此逃避兵役。[24]

該作者由此認爲應「使婦女民眾成爲農村婦女動員的主體」。[25] 其所以強調婦女民眾，乃是針對此前婦女工作偏重

24 水世琤，〈縣婦女工作與地方政治〉，《政治知識》（江西），卷 3 期 3（1943 年 5 月），頁 2。

25 水世琤，〈縣婦女工作與地方政治〉，《政治知識》（江西），卷 3 期 3（1943 年 5 月），頁 3-7。

發動婦女界領袖人物出席會議的形式主義作風。不過，此文雖然對農村婦女在行政上的作用有所認識，但這一認識停留在對實際現象的直觀陳述，尚未跳脫主流解放論述的框架，因此作者在批評智識婦女不能深入農村之餘，也提出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托兒所的政策主張，顯然還是以爲將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是動員農村婦女的第一步。在此可以看到，儘管直觀經驗與實踐已在改變，但在出現替代範式以前，主流論述並不會立即式微，依然能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知與反應。但無論如何，一些行政工作者確實開始意識到，農村婦女並不僅是一群無能無知的家事奴隸，而可能在地方社會與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積極的角色。

二、改變工作路線

事實上，即使在智識婦女工作者之中，在經過反覆的嘗試、挫敗、總結之後，也有不少人逐漸摸索出發動農村婦女的門徑。她們雖未必有脫離解放論述的意圖，然而就整個趨勢來看，確實以有效的工作，一步步向他人與自己揭示了舊有觀念行動框架以外的新視野，勢不可免地改變了過往對農村婦女的偏見。以今日語言加以總結，這些婦工人員不再負面的看待農村婦女的生活與能力，願意承認婦女在農村具體社會脈絡中所具有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並以之爲開展工作的憑藉而非斥爲阻礙。

沙仁的〈怎樣推行農村婦女工作〉這篇短文，相當全面且精闢地闡釋了戰時農村婦女工作的新思路與方法。文章開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工作環境的判斷：「假如是一個

有充分民主權利的地方，……」[26] 這句話顯示了作者與先前智識婦女解放論述的差異。如同前述，解放婦女論述乃是以中國農村是一個半封建社會開始其所有立論。然而沙仁顯然無意全盤接受此一不證自明的論斷，實事求是地提出在有充分民主權利的農村應當如何開展工作，從某種意義上否定了既有婦女工作框架的立論基礎。從沙仁的論證可知，他對中國鄉村現實的複雜性有較爲準確的把握。所謂封建保守的父權宰制並非均質的覆蓋整個地理與社會空間。或者說，在典型意義上，封建父權大多時候既不嚴密也不嚴厲，其內部存在大量空隙，可以開展婦女工作。所以沙仁以一種戰略家的高度，指引婦女工作者「選擇幾個頑固勢力比較弱，婦女文化水準較高，生活也稍微優裕的地方，集中火力去幹，必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由這工作成績，去影響與運動其他地方……」[27] 這意味農村婦女工作並不能一開始就按理論推演，從所謂受到壓迫最厲害，所以反抗最厲害的地方與群體著手，而必須有一個承載初步工作的政治社會「基礎設施」，也就是能夠接受外來幹部與觀念的社會環境。沙仁所謂「文化水準較高」的婦女，並非黎芳雨心目中的城市智識婦女，而是鄉村中讀過書的中層婦女。這些鄉村的智識婦女，確實比起城裡胸懷天下的新女性，或完全困於生計，不知民國無論抗戰的底層勞苦大眾，更適合作爲現代觀念與地方社會的媒介。她們有相當的識見，對自身社區以

26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2。

27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2。

外的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又天生嵌入地方社會網路之中，能夠以最爲當地人接受認可的方式推展工作。

有了初始工作的具體位置與對象人群，下一步就是爭取農村婦女的具體辦法。沙仁提出了以下原則：

> 抓住農婦迫切的要求（雖然這一點要求，不一定與抗戰有直接的關係的），並予以適當的解決，這不但解決她們本身的問題，而且也是解決工作基礎的建立的困難問題。……[28]

事實證明，所謂迫切的要求，並不是從半封建社會的壓迫中解放，而往往只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家務。一位有兩年工作經驗的智識婦女工作者就靠著主動幫忙做家事，成功地拉近了自己與農村婦女及其家人的距離。[29] 此種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即使眞如智識婦女所深信，農村婦女麻木的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她們也不可能如小說或電影中的人物，被外人一番奇妙言語打動，就能無情的拋夫棄子，大著膽子與整個社會抗爭，冒險追求一個充滿未知的人生。更爲現實可行的作法，是協助農村婦女從養家活口的日常勞務中，能夠稍爲偷個閒、喘口氣。更何況，如同上述婦工幹部所體會：

> 鄉村婦女們會為了這些親切的表現〔按：指幫忙家務、治病與解決生活問題〕，而大膽的親近你，因為她們最怕的惹人笑，惹人看不起，她們有著很深的自卑感，……。[30]

---

28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2。

29 魏貞梓，〈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59。

30 魏貞梓，〈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

以此來看，即使農村婦女的自卑感最後可以歸咎於半封建社會的壓迫，然其解除卻有賴智識婦女先放下啓蒙與批判的高傲身段，承認農村生活中柴米油鹽、喜怒哀樂對女性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要能認同半封建社會存在的合理性。將此同理心轉化爲具體的行動，如沙仁所說：

> 個別談話，確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假如不瞭解接近農村婦女的藝術，難免碰壁。……除了一般的起居寢食，還須留心家庭統一戰線的工作，幫助她們家庭的和睦，做工作要取得丈夫的諒解，以及特別同情她們內心的苦衷，在同情中去教育她們。一般的說來，在組織農村婦女中，這個方法是佔主要的地位。[31]

不同於敲鑼打鼓慷慨激昂的宣傳演講，農村婦女工作需要女人之間貼心交談的藝術。沙仁非常傳神地使用了藝術一詞，它表明在推進農村婦女工作時，要能善用個別談話此一主要方法，必須靠個人的細膩體會，而沒有現成可供遵循的明確步驟或話術。談話的重點並不在單方面宣教或空泛的噓寒問暖，而是同情地理解農婦的處境與眞實想法，並爭取其家人的信任與諒解，而這顯然要求婦女工作者放下解放者打擊守舊分子的教條，而重拾農村現實中認可的女性性別角色。另一位婦女工作者則更爲直白地道破了性別的決定性作用：

> 家庭訪問：這一種工作，是必需要婦女來擔任，妳們負起了這一種使命的時候，其過程，是由訪問的起

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59。

31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1。

> 點，而達到認識，談話，親熱的終點，這樣，在認識親熱以後，妳們就可以儘量地施展妳們所要做的事，例如：生活指導……精神談話……抗戰建國的真義……男子當兵，是榮譽的事……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溫和的態度，明晰的語調，有趣的口吻，渲染地，刺激地，講給她門〔們〕聽，婦女的心，最容易受感動，受刺激，一定能夠收到偉大的效果。[32]

不同於智識婦女的想像，傳統的女性性別角色並不僅是加諸女性的束縛，也可能是打開農村婦女工作僵局唯一的鑰匙。女性身分除了給婦女工作人員走門串戶的特權，讓她們得以進出男性不得其門而入的物理空間，更開啓了一個被啓蒙男性遺忘的心理空間。用一種現代女性平等意識的立場，固然可以將上面引文中「親熱」、「渲染地」、「刺激地」、「感動」等字眼都視爲誇大女性非理性特質的刻板印象；但若從當時婦女工作實務的角度出發，強調女性化的溝通與情感互動方式，其實是一種得來不易的巨大進步。它表明農村婦女工作已不再受單一普遍人性的啓蒙想像限制，而能開始直面不同性別、不同社會階層，乃至不同場面中，人們認知、思考、行動方式可能出現的巨大差異。畢業並任教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熊亞拿，從長期農村工作經驗中，總結了她所認識的農村婦女行事邏輯：

> 農村婦女重感情，「對人不對事」的特質是很明顯的。她們要先相信這個人，然後才相信這個人所做的事。[33]

32 薛中健，〈婦女工作應深入到農村的我見〉，《湖南婦女》（湖南），卷 1 期 4（1940 年），頁 3。

33 熊亞拿，〈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

她舉例指出，農村婦女往往是出於對「先生」（指女性婦工人員）的好感與友誼才來上識字班，而不是因爲實際上有識字的迫切需求。所以一旦熟識的婦工人員離去，她們也就失去參加的動機。而所謂「對人不對事」不光是交情深淺的問題，還關係性別角色是否正確。錯誤的性別角色與行爲從開頭就會扼殺任何進一步交往的可能性，熊亞拿因此特別告誡「工作者在農村婦女面前，切忌談戀愛或交異性朋友」，因爲戀愛自由，一如搞革命，都被農村婦女視爲不可接受的「非歪」之舉。[34] 反之，只要能維持亦友亦師的立場、親切而不失端嚴的態度，就能漸漸贏得農村婦女的信任，而在工作上勢如破竹。[35] 此種人際互動的分寸誠然不易拿捏，卻遠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意識形態話語更能打開農婦的心扉。

如同個別談話需爭取農婦家人的配合，農村婦女工作要能普遍開展，也必然需要聯通地方人際網路。一個有「智識」的婦女，或許能伶牙俐齒的傳述婦女支持抗戰的理念，但她未必是地方人際網路中說話有份量的人。一味以智識婦女爲動員對象，而不考慮她們在農村熟人社會中的具體影響力，正是先前工作受阻的重要原因。也因此，越來越多有經驗的婦女工作者，開始注意那些看來沒什麼智識，卻在人際網路中有「話份」的女性。沙仁即指出，除了以智識反應能力挑選年輕有政治認識的積極分子，「還要多多留意那些政治認

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63。

34 熊亞拿，〈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65。

35 熊亞拿，〈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64-65。

識很欠缺，卻具威信的婦女，如老太婆、忠烈寡婦……」[36] 許多婦女工作者都提到老太婆的力量。這些人雖然沒有什麼知識，卻是受人尊敬信賴的長者，也是人際網路的重要節點，只要她們能接納婦女工作，其他婦女的態度也會爲之改變。由此，有經驗的婦女工作者普遍建議：

> 實在說來，婦女們因為文化水準落後，因為生活和教育思想、職業的不相同，根本不能用一個固定形式來組織她們。動員目的既為了抗戰，則只要於抗戰有利的，我們就不妨採用，進步的婦女抗敵會固然好，落後的姊妹團也能吸收大部分群眾，甚至母親會、互助會，儘管名義上和抗戰無關，可是只要能適合一部分人，就能利用這個形式。[37]

沙仁說得更透徹：

> 只要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聯繫或行動，例如什麼姑姨姊妹、乾媽。——這一類的聯繫上，可以利用，把姊妹組成「姊妹團」，把所有的乾媽組成「乾媽隊」（當然名稱可以按各地具體情形，各有不同）。再如：鄉村的老太婆，喜歡誦經拜佛，她們希望彼此傳授「佛經」，或一同進香，那末工作者就切實的幫助她們，進行有組織的行動，使得她們彼此都很方便。……如能先就組織老太婆，然後去進行普遍的組織，這個是

36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2。

37 夏英喆，〈抗戰以來婦女工作之檢討〉，《時事類編》特刊（重慶），期 30（1939 年 1 月），頁 59。

> 「上策」，因為老太婆在鄉里除了自己的威信很高以外，她還自然的團結了一部份人——家裡的媳婦、未出嫁的姑娘、鄰近的嫂子。[38]

至此，戰時婦女工作的整個概念行動框架，算是大體實現了轉型。工作重心逐漸由「解放」出來的智識婦女，轉向社會關係中的農村婦女。工作方式也從外部宣傳，走上內部動員。隨之而來，婦工人員也因爲自身視野的轉換，而對農村婦女有了新的評價。那些曾經看來落後無能的特質，如今在一些婦工人員的眼中，卻似乎是農村婦女力量的泉源：

> 這種勤儉起家及刻苦耐勞的精神只有農村婦女才充分的把它表現出來。農村婦女不但能在家庭中表現她們的力量，如果得到適當的領導，她們更將在社會集團中發揮之。[39]

實務經驗證明，農村婦女正因爲承擔了種種智識婦女不屑爲之，卻爲家族鄰里所仰賴需要的生活勞務，自然而然的擁有了左右家庭社會的強大力量。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在這一轉型的過程中，儘管部分智識婦女曾是問題的來源，但她們之中少數兼具熱情理想、現實意識與苦幹精神的傑出分子，卻也是打破農村婦女工作僵局的關鍵力量。可以說，智識婦女也許未能在自己編寫的現代啓蒙史詩中扮演可歌可泣的主角，卻意外的在鄉土抗戰歷史劇中，擔任發揮關鍵作用的「女配角」，與劇中的主角

38 沙仁，〈怎樣進行農村婦女工作〉，《婦女生活》（重慶），卷 9 期 1（1940 年 7 月），頁 21。

39 熊亞拿，〈農村婦女工作經驗談〉，《社會行政季刊》（成都），卷 1 期 1（1944 年 3 月），頁 64。

——廣大的農村婦女——精彩互動而相得益彰。以下，本文將以抗戰時期浙西昌化縣爲例，呈現戰時婦女工作從受挫、轉變，到取得進展的具體個案，以及過程中智識婦女與農村婦女實際的作用與關係。

三、一個成功案例

昌化（今屬浙江省臨安縣）位處浙西前線天目山西南麓，在日軍佔領的杭州西方約 50 公里。先前因爲太平天國戰事，江南人口銳減，成年男子尤甚，昌化也僅餘 8 萬多人。相對於天目山以外富饒的湖州與杭州平原地區，昌化的經濟雖稱不上發達，但已相當的商業化。由於自然資源堪稱豐裕，人均可用資源較高，居民主要靠出賣山產，如核桃、竹、木材木炭，以換取現金購買糧食與生活用品，維生並不困難，當地諺語有「富不過萬，窮不討飯」，道出了此地居民財富平均生活小康的社會型態。戰前國府修築的杭徽國道，加強了昌化聯絡杭州安徽貿易孔道的地位。因此，昌化雖屬農村，但風氣尚不閉塞，縣裡有不少出外經商讀書工作的家庭，這些家庭中的婦女，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些甚至在外地取得初中以上的文憑。不過大體上，昌化的上層智識婦女仍是鳳毛麟角。讀過幾年書的中層婦女雖不算少，但大字不識幾個的下層農村婦女仍居於絕對多數。

抗戰爆發後，大部分浙西地區不是淪爲敵佔區，就是敵我交錯的戰區，因爲地形險峻而不易佔領的天目山區，一時躍升爲國府屏障浙東、進圖恢復的主要前敵根據地。位處天目山最後方、毗連皖南的昌化，也因此成爲重要的軍運輸紐

與後勤基地。各種兵差與政務的重擔，也隨之落在昌化縣政府爲數不多的官員肩上。在此背景下，從 1938 年初受命掌理昌化縣起，如何以極有限的縣府幹部，動員民眾配合繁重戰時政令與勤務，就是年方二十六歲的董中生必須面對的難題。

董中生畢業於國立勞動大學與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是一個學習土木工程與土地測量的理工科畢業生。像大多數具有「科學頭腦」的新時代青年，董中生期望依靠如他一般廉能的智識青年幹部、以鐵面無私不講人情的工具理性，建立健全高效的行政組織，並賴以完成動員民眾支持抗戰的任務。董中生在其施政的頭半年，確實也遵照此一他稱爲「剛性政治」的行政路徑，在一群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畢業生的協助下，大致恢復了縣政府在行政體制與書面上的日常運作，也即時完成了諸如破壞公路一類的緊急任務。[40]

然而，從檔案與時人證詞來看，1939 年以前，各種緊急指令已使董中生的縣政府應接不暇，談不上實際治理。隨著 1939 年昌化縣恢復徵兵以及國軍挺進浙西，戰爭動員壓力日益迫切，原本僅能勉力支撐的局面，更加難以維持。1939 年先後兩份視察報告，都對董中生的縣政評價極爲負面。浙西行署的視察組指出，昌化縣長「主觀極強」，有用人唯親之嫌，民間有諺譏嘲「於潛未淪陷，昌化已東陽」。且該縣區長素質不但爲天（目山）南各縣最差，縣府員工甚至上班時間賭博。[41] 另一組中央派來的視察團則更直言董中生雖工

40 董中生，〈五年的工作幹部和工作階段〉，《服務》（重慶），卷 7 期 11／12（1943 年 12 月），頁 9。董中生，〈我如何做縣長〉，《服務》（重慶），期 5（1939 年 7 月），頁 39-43。

41 董中生是浙江東陽人，與代指日本的東洋同音。於潛在昌化東側，夾在該縣與日軍之間，若日軍進攻，理當先淪陷於東洋人之手。「昌化

作努力但缺乏經驗，以致「縣府多無能之輩。」[42]男性幹部主導的「剛性政治」成效之差，由這些批評可以想見。換言之，「剛性政治」由於其重理性輕人情的行事作風，受到地方人士的強烈反彈而陷入困頓。就在該年三月，浙江省主席黃紹紘將到昌化實地視察，縣長勢必得拿出亮眼的工作成績。於是視察前一週，縣府啓動了婦工幹部的訓練工作，同時雷厲風行的查禁賭博。這些舉措不無應付視察而推出面子工程的嫌疑。

從現存材料來看，昌化民風確實好賭。男女老少大規模聚賭常見於各類婚喪喜慶場合中，婦女尤其賭性堅強不讓鬚眉，使原本男女無別的風俗更加氾濫。其情景如董中生所描述：

> ……賭博到了深更半夜，濟濟的人，便男女雜陳橫躺直臥，加之神志迷糊，顧不到羞恥，兩性關係最易攪亂。昌化對性的問題，不甚嚴肅，因此淫蕩之風，彌漫全境。[43]

因此，男女聚賭往往引發大量難以處理的家庭與財務糾紛，尤使官員不勝其擾。一些智識階層的目擊者甚至認爲，昌化的貧困，使得婦女熱衷賭博以改變經濟狀況，而爲賭債所迫的婦女，又催生了淫亂的風氣。某位造訪昌化的女記者還如此分析：

已東陽」即諷刺董中生治縣無方。見〈浙西行署天南視察組關於巡視戰鬥中的「天南」報告〉，浙江省檔案館藏檔案（簡稱浙檔），檔號 L029-001-0985，頁 25、44。

42 〈浙江政情報告〉，浙檔，檔號 L033-001-0637，頁 25。

43 董中生，〈如何嚴禁賭博〉，《董中生先生全集・中冊・戰時縣政》（臺北：作者自印，1999），頁 306-307。

> 其所以會造成賭博旺熾的風氣，是她們想以賭博的勝利來挽救她們悲慘的生活，同時因為這裡沒有一種正當的娛樂，公園當然談不上，就是戲院也沒有一隻〔原文如此〕。[44]

這樣的理性觀點雖非全無道理，但很明顯投射了智識婦女自身關於性與正當娛樂的道德觀或品味，其背後的深層預設依然是：活在「悲慘世界」中的農村婦女不可能擁有主動追求歡娛的主體性。就此而言，董中生在昌化同時推動婦女訓練與禁賭，不僅是他個人應付長官的一時權宜，同時體現了一套關於進步與禁欲的主流價值對其理解現實的強大制約作用。

這次臨時起意的訓練倒也不是全無憑藉。早在 5 個多月前，也就是 1938 年 10 月，先後約 20 餘人次的女學生婦工幹部，就曾在昌化舉辦了一次為期近一個月的婦女訓練。這次蜻蜓點水式的下鄉工作，無非聚集一群稍有智識的「農婦」，教授一些國家觀念與愛國歌曲，接受簡單的軍訓，學習戰時常識與救護包紮的技巧，其內容基本不脫前述抗戰初期智識婦女的設想，以普及抗戰意識為主，並無持久組訓運用農村婦女的準備。[45] 參加這次訓練的成員，雖然號稱有 400 餘人，但智識婦女幹部對大部分學員的智識評價甚低。[46] 整個訓練的重點實在於 65 名 15 到 30 歲受過小學教育的地

44 珮璉，〈萬山叢中的昌化婦女〉，《女聲》（上海），期 12（1943 年 4 月），頁 14。

45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8。浙江省第三流動施教團，〈昌化縣河橋區婦女訓練班實施經過〉，《進修》（浙江），期 5（1939 年 2 月），頁 25。

46 浙江省第三流動施教團，〈昌化縣河橋區婦女訓練班實施經過〉，《進修》（浙江），期 5（1939 年 2 月），頁 31。

方「智識婦女」。以昌化的文教水準，這 65 人大概就是當地所有「上層」婦女的總和。董中生宣稱 1938 年 10 月的這次「試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從此後婦女工作偃旗息鼓近 5 個月來看，直到上級視察的消息傳到昌化以前，董中生並不認爲這次訓練有何用處，至少他並不相信已經訓練過的 400 餘名婦女足以贏得長官的讚譽，而寧可只動員那 65 名年均 20 歲的智識女性，還爲她們置辦新制服。[47] 在董中生的盤算中，讓這些已讀過小學的智識婦女，接受一週的訓練（或者說排演列隊唱愛國歌曲），實在比眞正發動農村婦女來得更爲重要，也更可靠。此次訓練具體情形如下：

> 因為少數教官的不懂婦女心理、只知打官話，消極批評。由於婦女的心地偏狹，卻常鬧彆扭，花了縣長許多勸勉和安慰的功夫。這使我們得出一個經驗教訓，就是任何民眾工作，如果僅竟〔按：原文如此〕由上而下的信念，不去研究實際的材料來辦，十九是很鮮成效的。[48]

學員時常鬧著彆扭，休說學習效果不容易好，若非縣長好生安撫，可能連訓練都無法完成。男性官員姿態高，多批評而少鼓勵，缺乏教育經驗，沒有照顧女性怕羞又好勝的顏面與心理，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面對這群背負著挽救縣府官員考績重任，縣長都對之「十分客氣」的年輕女學員，教官們卻不能保持良好的態度，其實還有另一層因

47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9。

48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9。

素，亦即董中生提到的「由上而下的信念」。這話似乎語焉不詳，不過若與訓練課程兩大特點內容結合著看，也就不難理解：

> 加增軍事術科，各個教練和基本動作，務使力求確實，特別認真，並訓練她們指揮管理的能力。
>
> 注重會議訓練，……舉行著座談演講批判，檢討同樂等各種會議，培養她們講話的口才，使之有領導一般婦女的能力。

的確，指揮與溝通理論上是幹部需要具備的能力，實際上卻是將主要施之於男性的現代軍訓與新式學堂流行的演講座談等形式，驟然不加變通的落實在這群閨秀身上。她們被要求在一眾陌生人面前勇於表現自己，反覆練習著揮臂抬腿，對不熟悉的議題張口便來，既無趣又令人尷尬。甚至期待她們 7 天之後盡量做到操演隊形整齊劃一，批判檢討口若懸河，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隨著檢閱時限逼近，進度滯後壓力增大的教官失去耐心難以自制，困窘不堪、手足無措的學員更是益發委屈、心懷不滿。若問課程何以如此設計？時間何以如此緊迫？無非就是希望擺出亮眼的表現獲得上級好評，其中深刻蘊含的信念，是包括董中生等一眾官員盲目追求與推行的現代理性價值與城市文化風尚。

3 月 25 日，黃紹竑在昌化一天一夜的視察結束了。董中生以爲可以鬆一口氣，卻萬萬沒有料到，僅僅 4 天以後，昌化就爆發了幾乎釀成民變的激烈官民衝突。而此次衝突所以激烈，正因爲牽涉了賭博與婦女。

省主席前腳才走，3 月 27 日，全縣最富裕的龍峰鄉居民就迎來戲班，大開賭局。29 日董中生聞訊，立刻派 20 餘名

員警前往取締。當地居民賭興正旺，非但置若罔聞，還圍毆員警並奪取槍械，將他們扣押整夜，直到 30 日才放人。同日，縣府派員交涉調查，該鄉鄉長卻連同戲班轉往附近的乾盤鄉繼續賭博。董中生不得不親自出馬，於 31 日率領一組武裝的自衛隊員追蹤而至。爲了立刻解散賭博盛宴，董中生下令自衛隊員將表演助興的戲班收押帶走，熱鬧的宴席被迫中止。董中生以爲已控制局勢，便讓自衛隊員押送戲班到區署，自己前往龍峰鄉繼續調查追究。沒想到他才剛走，憤怒的乾盤鄉民就在半道上攔截了自衛隊。當自衛隊拒絕釋放戲班，情勢遂完全失控，演爲官民互射交火的武裝衝突。自衛隊一路且戰且走，撤退至龍峰鄉。聽到槍聲的董中生趕到現場制止槍戰，但已有一名新娘被流彈擊中而喪命，此外還有一對母子中槍受傷。[49]

倉促舉辦的禁賭與婦女訓練，顯然未能改善董中生施政的困境，反而衍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此事變以縣政府出錢賠償死傷者告終，或許因爲缺乏替代人選，上級並未深究，董中生勉強保住了職位。然而就在幾乎山窮水盡的時候，董中生體現了青年從政的最大長處：年輕人或許見識淺薄經驗貧乏，卻較能放下成見，隨機應變。絕境中的董中生或者是迫於形勢，或者是靈機一動，竟大膽掙脫了過往的認識實踐框架，意外發現了另一種處理婦女工作與政務的思路，終而能化危機爲轉機。儘管董中生在事後回憶中，有意淡化了此次不幸事變對其後施政的啓發，但從其敘述與昌化縣政後續的發展中依然可以發現，此次事變徹底扭轉了董中生基於智

49 董中生，〈抗戰前線縣政回憶〉，《東方雜誌》復刊（台北），卷 11 期 6（1977 年），頁 63。

識階層啓蒙意識型態的「剛性政治」思維，取而代之的是對農村婦女「非理性」力量的重新認識與把握。以下本文將力求根據董中生的回憶與檔案資料，試圖還原此番轉變的可能歷程。

如前所述，在各種節慶場合聚賭本是昌化風俗，從新娘中彈身亡可知，這次大規模聚賭唱戲還是起因於婚禮宴客，這也是鄉民何以對取締行動如此群情激憤的緣故。在他們追圍堵截自衛隊員的過程中，傷亡者以婦女爲主。如果不是巧合，就不能排除是婦女不讓鬚眉，衝在人群前面，試圖要回她們花錢請來的戲班。或許此時董中生才驚覺，他原本認爲深受賭博之害的昌化婦女，非但不是貧困與劣俗的受害者，也不是只會哭哭啼啼，蠻不講理，令行政官員瞠目結舌的愚婦，她們其實也是一切「劣俗」背後的促成者與擁護者。至此，他恍然大悟，開始對昌化婦女進行嚴肅的分析：

> 昌化自洪楊亂後，普遍感覺到了人力不夠，無知農民，以兒童媳婦與早婚來解決勞力荒。……祇有娶個媳婦年齡比兒子大些，既可早養孫子，又可幫助家庭勞作，兼養她的丈夫。昌化人稱呼自己的妻子為「老娘」，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昌化婦女的權力相當大。例如家庭經濟權，大都操在她們手裡，男子借不到債，婦女卻有辦法通過債權方面的女當家，而借得到。你如果要向昌化男人談起「錢」和捐錢的問題，他們很少敢肯定的答允，常會回答你「我要去問問家裡頭看的」。[50]

50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24。

原來與智識階層的想像大相逕庭，在半封建的童養媳制度下，昌化婦女雖然勞苦，卻因爲自小替她們的男人把屎把尿，包辦家務，而在家庭中享有意想不到的巨大權力。同時代另一份材料也證實，昌化的童養媳經常比丈夫大 5 歲左右，因此她們對於自己的配偶而言，與其說是「妻子」，毋寧更像是「老娘」。[51] 在此情形下，她們控制家中經濟大權實在是理所當然。在昌化普遍小康的社會中，掌握「金融」的女人們拿著自己控制的錢去賭博或放債，顯然更多出於主動，而不必然是被生計所迫。進一步來看，昌化的「淫蕩」之風，並不是半封建父權控制失靈的特殊病理現象，而是其運作的常態。一位城市智識婦女，在居高臨下的哀嘆了昌化農婦「牛馬似的」的悲慘勞動生活之餘，又以似褒實貶的異樣筆調，分辨了昌化婦女完全不受封建觀念拘束，看似女權高張的男女關係：

> 昌化有著一種與別地特殊的風氣，就是對女子的貞操觀念，並不像其餘各地來得重視。這裡一個女子的再嫁，是並不當一會事，很普通，就是一個女子有著一二個丈夫以外的野丈夫（丈夫以外性的行為），也司空見慣，……在這裡難得有個女子是安分守己規規矩矩的；如果一個男子，不論熟悉或陌生，跑到他們的臥室去，甚至躺在床上，不但不會遭到侮辱，而且非常歡迎，殷切的招待；即使其本人丈夫碰見了，也不至於怎樣的憤怒的，他會當作沒看見似的故意避開去。但這種現象不能說便是提高女權，尊重女性，這

51 〈昌化經濟、天北政治得失評判、學術的誕生、天北民眾抗戰史略〉，浙檔，檔號 L033-001-0627，頁 43。

> 裡同樣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其實這裡的封建勢力是與其他處地偏避的城鎮一樣的牢固，這祇要看他們過舊曆新年的風俗，就可得到證明。[52]

她筆下的「特殊的風氣」，其實不過是童養媳婚姻的常見狀態，反映出智識婦女對農村父權社會實況複雜性的少見多怪。童養媳與其夫因爲從小形成的照顧關係，而難以對彼此產生情欲。也就是說，這種農村婦女的男女關係，只有在智識女權主義者眼中才顯得異常的「進步」或「解放」。[53] 整個天目山區都可以發現此類性行爲所衍生的社會糾紛。駐防此地的軍政長官也都和董中生一樣，經常必須處理諸如媳婦與人私奔等家務事。[54]

與以上這段紀錄相對照，再來看另一位智識婦女對昌化附近另一個天目山縣的觀察，就可以再次看出，智識婦女受到解放論述的誤導，對於農村的性別問題瞭解甚少，以致根本搞不清楚眞正需要「解放」的關鍵所在：

> ……主要的應該解放童養媳和婢女，因為這一群可憐的羔羊，是天天受到直接壓迫和威脅的，必須急切的激發其潛在反抗力量，到抗戰的陣營來。[55]

類似的自以爲是，也可見諸一名記者在離昌化不遠的地方，偶然目睹了一份懸賞捉拿逃妻的告示，就逕自將其與一旁張

52 珮璉，〈萬山叢中的昌化婦女〉，《女聲》（上海），期 12（1943 年），頁 14。

53 Arthur Wolf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4 毛森，〈往事追憶——毛森回憶錄（四）〉，《傳記文學》，卷 75 期 5（1999 年），頁 121。

55 曼華，〈安吉婦女生活的一角〉，《天目》（浙江），期 28（1939 年），頁 9。

貼的公豬配種傳單聯結，而大發議論：

> 雖然根據自己一些社會科學的常識，從這幕可想見浙西農村社會一般情態，但似乎還更有耐人去尋嚼的一種辛辣的滋味。……一張是為公豬徵婚，另一張是懸賞捉拿逃妻。這是不可名狀的對女同胞的侮辱。可是又是多麼平淡的社會告白！[56]

這段敘述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這名記者宣稱自己的分析根據社會科學的常識，但實質上是模仿魯迅的雜文風格，以濫情的文學隱喻與聯想手法，將其並不眞正理解的具體社會現象，放入符合主流進步論述的陳腔濫調中。這一套帶著「科學」頭銜的解釋架構與技巧，既無事實基礎，亦無洞見，卻擁有直觀上的強大渲染力。深諳此道的智識階層卻由此長期以空疏的宏大敘事，替代對現實的深刻觀察，以致在包括婦女工作等領域在內，形成大量不切實際又難以糾正的政治議程。然而，這些關於昌化、天目山，乃至整個中國農村婦女浮濫膚淺的言論，卻適足以反襯董中生重新認識昌化婦女之難能可貴。畢竟，在施政的頭一年中，董中生在實務上已然接觸到舊有框架難以解釋的性別與社會現象，但這並不意味他必然會在禁賭事件後改弦更張。在智識階層主流意識型態與論述的包圍下，多的是終生對現實視而不見、執迷不悟的所謂進步知識分子。也因爲處在智識階層主導的話語體系中，董中生的言論、回憶，無可避免具有附會主流論述的傾向，這固然增加後人正確解讀的難度，卻也在字裡行間留下大量蛛絲馬跡，使有心人能不時瞥見言辭粉飾之後歷史動人

56 尚辛，〈捉拿逃妻——浙西生活雜感〉，《浙江婦女》（浙江），期3（1939），頁 100。

的素顏。

無論如何，一旦董中生開始重新審視其過往的失誤，他得出了一個完全悖離智識階層共識的結論：

> 她們〔昌化婦女〕相當自尊，很少重男輕女心理，好像自己真正達到了「男女平等」的境地。根據我們捐款、派夫、徵兵的經驗，甚至保甲長的話，遠不及她們的母親或妻子講的話有力量。[57]

董中生開始意識到在「剛性政治」之外，還存在借重「老娘」開展施政的可能性。

在董中生 1939 年呈給省府的報告中，昌化婦女工作被描繪成由智識婦女幹部爲主力，按照計畫按部就班，漸次擴及農村婦女組訓的過程。[58] 這樣的說法無疑符合智識婦女的解放論述。但仔細閱讀董中生的敍述，並參考檔案就會發現，這樣一個高度理性化的婦女工作圖景，其實是模糊大量重要細節與具體順序後的粗描概括。還原後的眞相更接近下述：爲了應付長官而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本身因爲缺乏適合的女性幹部，而以男性官員講演的形式倉促實施。這些男性大打官腔，引發受訓婦女情緒反彈，從董中生用「安慰」、「功夫」等字眼可知，他必是花了相當力氣，才止住受訓婦女委屈的眼淚。隨後雖然在兩個鄉舉辦了一般婦女的普遍訓練，但還是因爲缺乏眞有能力的女性幹部而無明顯效果。董中生已然明白：這樣從上而下說教式的訓練，就是吸引智識

57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24。

58 〈於潛、昌化、安吉縣政府工作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56，頁 7-8。

婦女都有困難，根本無法眞正動員農村婦女。[59]

該年底浙西行署成立，統一指揮浙西前線各縣。行署主任賀揚靈帶來了一批以浙東初中生爲主的智識婦女幹部，董中生以婦女訓練開展行政的念頭，終於有了落實的機會。昌化縣政府立刻呈送了全面訓練婦女的計畫，並得到行署批准。1940 年 2 月，浙西行署婦女營進駐昌化，大規模婦女訓練正式啓動。首先，昌化縣政府又召集那 65 名本地智識婦女（實到 60 人）。由於這些婦女「幹部」早已「忘記」先前訓練的內容，婦女營只好又重新來過。[60] 此一過程頗費周章，很難避免遭遇以下這樣的困難：

> 幾位唸過書的女兒們看見穿草鞋的婦訓教官已早一溜煙走了，弄得介紹人也左右為難，很是尷尬。……昌化婦女既有優越的家庭地位，問題倒不在家長反對，而是很多婦女受了智識婦女煽惑。原因是女學生軍穿著破舊的灰布制服，加以連日奔走，一副散兵模樣的神態，難以得到她們的信仰，而故意阻擾。[61]

---

59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33。

60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33。

61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25-126。浙江省第三流動施教團，〈昌化縣河橋區婦女訓練班實施經過〉，《進修》（浙江），期 5（1939 年），頁 31。董中生此段敘述描寫的是 1938 年 10 月昌化首次婦女訓練的情形。現存昌化縣政府檔案幾乎全是 1939 年後產生的。最早只提到 1939 年 3 月動員 65 名智識婦女。從其他史料來看，所謂為期 1 個月的首次訓練，是由幾個不同婦訓單位接替舉辦的短期訓練集合而成，人員與課程並不全然連貫，只是在董中生筆下呈現出通盤開展層層遞進的態勢。其中一些內容，如婦女自發集會，發動兒童等，更像是個別訓練

這段敘述透露許多重要訊息。首先，董中生所謂的「智識婦女」乃是昌化本地受過小學教育的女性。但依照城市中智識婦女的標準，這些人由於不具備城市的慣習，所以稱不上有智識，而只能屬於農村中的上中層婦女。換言之，存在兩種產生於不同社會脈絡中的智識婦女認同。且因爲不同的慣習，鄉村智識婦女反而頗爲輕鄙外來智識婦女的衣著言談。這種衣著上的歧視，可說與排斥智識婦工談戀愛一樣，都是農村婦女對可接受性別角色的表態。若說軍裝草鞋，在城市智識婦女的認同中意味男女平等吃苦耐勞，在鄉村智識婦女眼中就不免成了暴露身形肌膚的「非歪」之舉。且不論誰才是眞正有智識的進步力量，鄉村智識婦女的「淑女風範」，起初顯然比其競爭對手的「花木蘭」風格與啓蒙解放論述，更能左右一般農婦對婦女工作的觀感。根據董中生的描述，這場城鄉「智識婦女」之間的較量，最後隨外來女學生幹部「迂迴戰術」的奏效而見分曉。外來幹部既無法動員本地的智識婦女，索性直接尋訪中下層農婦。此時，昌化相對平等的社會，與「老娘」們極大的自主性，使得破解本地智識婦女的抵制成爲可能。不久，外來女幹部已招來一批農村婦女，每天與她們一道在田野中唱歌談笑。這些充滿趣味的活動，以及參與者展現出的自信自在，似乎是「撩撥」了原本

結尾時舉辦的成果展演活動，不太可能是長期普遍的狀況。據此，董中生很可能是總結濃縮昌化所有婦女訓練的經驗，塞進首次婦女訓練的時段內。這種以事後之明重構實行步驟進程的作法，頗適合分享行政經驗，但歷史研究者必須注意分辨。限於資料無法指明所引敘述發生的確切時間，然而綜合本文前述各地婦女工作實際開展的情形，在外來女學生幹部大量湧入昌化，基本上接管本地婦女工作的時候，本地智識婦女不滿外來幹部衣著言行，影響底層婦女響應動員的情形，確實極有可能（再度）發生。

矜持的本地智識婦女，使她們意識到「小學畢業並不怎麼了不起」，頗有被受訓下層農婦後來追上的危機感，從而在好奇心與好勝心的驅使下，終於半推半就加入了婦女訓練。[62]

綜合檔案材料來看，昌化婦女訓練從智識轉向農村婦女的現象就更明顯了。從 1940 年 3 月以降，在婦女營與本地培養的婦訓幹部支持下，婦女訓練不再集中於縣城，而分散到各鄉鎮，乃至村落中，學員因此可以在家附近受訓，不必離家住宿；訓練時間也由整天集訓，改爲配合農婦家事作息，於每天早上下午做飯的空檔舉行。婦訓幹部以 2 或 3 人一組，「以補能力不足之短」，深入農戶之中，利用昌化本地常見的佛教與基督教傳教方式，開展普通婦女的訓練。[63] 此種訓練方式不再強調在固定的課堂中單方面聽「先生」講演，而著重在輕鬆自在的場景中，例如遠足，透過成員之間的討論分享建立團體認同。此一轉變符合前述融入農村社會脈絡的婦工發展大趨勢，印證了昌化婦工的務實與落實。從昌化婦女工作的組織與編制架構來看，婦女營外來幹部還要負責訓練培養本地幹部，因此董中生所言必須 2、3 人一組，「以補能力不足之短」的下鄉婦訓幹部，當以本地婦女爲主，外來幹部爲輔。[64] 從個人演說主持的台風與膽量而言，本地人或許確實能力不足，但就社會影響力來說，這些曾煽動農婦反對女學生軍的本地幹部，無疑更有辦法。從此角度

62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26。

63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34。

64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頁 136。

理解，若按不同村落，將當地人與外來幹部靈活搭配，就能互補長短，增加與工作訓練對象產生社會關係的可能。況且，在這種人際關係導向的訓練中，兩三熟人帶起的談話小組，遠比一個外人單方面的宣講更容易引起受訓農婦的興趣。無論如何，就以此種看來既不嚴肅又無效率的方式，到了 1940 年 6 月 8 日，董中生終於能在賀揚靈等長官面前，展現貨眞價實的訓練成果，使上級對其施政能力大爲改觀，在視察報告中留下佳評。[65]

就在婦女工作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昌化縣政府推動了許多重大政策，兩者之間顯然有一定的因果關係。1940 年冬，董中生大膽將婦女與民兵組織土槍隊合併編組，擔任各項政令的急先鋒。例如每保以 12 名土槍隊壯丁與 10 名受訓婦女組成互助隊，動員昌化百姓從事大規模的冬耕義務勞動，以增加糧食生產。[66] 這些下田勞作的女性隊員顯然來自道道地地的農家。有趣的是，在工作報告中，董中生在誇獎互助隊工作成績之餘，順帶提及了男隊員「釁辱」女隊員的情事。從董中生淡定的處理意見可知，相較於禁賭時對男女雜處「淫蕩之風」的一驚一乍，這位年輕縣長在領教了老娘們的能耐以後，已不會爲昌化男女間有違禮俗的行徑大驚小怪。他明白，只要不過火，男人們也就是佔點小便宜，還不是得

65 董中生，〈我們如何組訓婦女〉，《服務》（重慶），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浙江省第一區行署春季視察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86。

66 董中生，〈一個工作實例——組訓民眾掃除文盲互助耕作自衛自給〉，《特教通訊》（浙江），卷 5 期 6（1943 年），頁 13。〈提案擴充冬作物栽種面積辦法大綱並經費預算〉，浙檔，檔號 L033-002-0060，頁 10。〈昌化縣冬作物〉，浙檔，檔號 L033-002-0046，頁 4-6。〈浙江省第一區行署春季視察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86，頁 29。

乖乖跟著老娘幹活。[67] 董中生的大膽編組取得顯著成功，開墾的土地超過 15,000 畝，此一政策由此也爲浙西行署大力推廣。[68] 1941 年開始，由老娘與土槍隊混編的工作隊又投入掃除文盲的工作，使婦女訓練與識字教育結合，成爲鄉村基層組織的長期工作內容。[69]到了 1942 年時，訓練的婦女已超過 1,000 名。[70]

在昌化縣政府的組織下，老娘們更實現了婦女支持抗戰的理想，她們不僅爲部隊發起縫衲新鞋的「一人一鞋運動」，還積極承擔運送照顧後送傷兵的任務，使不少飽嘗民眾輕視之苦的部隊長官感動不已。[71] 農村婦女與土槍隊的結合編組，實際上成爲昌化縣政府推行政務最重要有效的基層執行組織，使得昌化能夠更爲充分且合理的動員與分配民力，從事各項兵差與驛運勤務。儘管董中生沒有明講，但不難想像，諸如分配挑夫之類吃力不討好的業務，若無通曉村裡各戶實情的老娘們支持協助，而由政府保甲長直接與那些凡事問「家裡面看的」壯丁接洽，其效率與公平性恐怕會大打折扣。

---

67 〈昌化、建德、開化、富陽縣政府二十八年度工作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33，頁 14。

68 〈浙江省第一區行署春季視察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86，頁 29。

69 〈昌化經濟、天北政治得失評判、學術的誕生、天北民眾抗戰史略〉，浙檔，檔號 L033-001-0627，頁 307。〈浙西行署行政談話會會議卷（各種經濟問題報告）〉，浙檔，檔號 L041-000-0014，頁 23。

70 〈偽浙西行署地方幹部訓練計畫報告〉，浙檔，檔號 L041-000-0055，頁 5。

71 一人一鞋為兩人共同完成一雙鞋。董中生，〈黃紹竑三任省主席〉，《董中生先生全集・上冊・浮生四記》（臺北：作者自印，1999），頁 40。

可以說，在老娘們的幫助下，昌化縣政府取得了前所未有組訓民眾的能力。此種能力很快顯現其在戰爭中的非凡價值。1940 年 10 月，日軍再次對整個天目山區發動大規模的掃蕩。面對敵人氣勢洶洶的進犯，軍方要求各縣做好破壞一切堅壁清野的準備。昌化也奉令要預先炸毀境內 5 座乾隆年間造成的石橋。董中生沒有接受軍方嚴厲的命令，而是力爭保留這些百姓生活所需的公共資產，並以項上人頭擔保於日軍將渡之時完成爆破。昌化嚴密的基層組織是董中生甘冒風險的底氣所在。事後證明，由於有效組織民眾監視敵方最新位置，昌化縣政府能在大敵面前，從容不迫的進行人員物資的疏散與破壞。在包括老娘在內所有民眾互相信任、齊心合力的應變下，加以日軍在進入昌化前即行撤退，地方上的損失微乎其微，寶貴的古橋也因此被保存下來。在給省政府的報告中，董中生對此不禁流露出由衷的欣慰之情。[72] 此後，董中生及其領導的昌化縣便始終是天目山區，乃至浙江其他縣府效法的對象。

結論

以上這段故事，自可按外來智識婦女的觀點，描述爲啓蒙戰勝半封建勢力杯葛的解放進行曲，但董中生透露的豐富細節，使另一個版本的敘述似乎更爲可信：只有當智識婦工不再執著於動員自己的鏡像（鄉村智識婦女），而以親親姊

72 〈於潛、昌化、安吉縣政府工作報告〉，浙檔，檔號 L029-001-0956，頁 104。徐崖松，〈董中生在昌化二三事〉，《東陽文史資料選輯》，輯 4（1987 年），頁 129-130。

妹的身分直搗老娘的心房，她們才第一次擁有與鄉村智識婦女抗衡的行動資源。事實證明，是感性的認同，而非理性的說服，先引發了沒什麼政治覺悟但心胸開朗老娘的回應，然後才能吸引那些懂得道理卻多所拘忌的鄉村智識婦女。而整個訓練工作的深化與功能的擴大，也是以非智識婦女的老娘爲主力，仰仗她們在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力量，才能得到成果。在整個過程中，與其說政府以理念論述解放了婦女，還不如說是政府成功地使自己與老娘的社會網路纏結在一起，因此從一個理性中存在的抽象概念，成爲能夠與人民互動的社會實體。是董中生與智識婦女，被老娘們從徒講理性的啓蒙式「剛性政治」困境中解放出來。

昌化婦女訓練的成功經驗，不僅可作爲反省智識婦女解放論述的一個案例，或許還具有修正近代世界政治史敍述的普遍意義。如同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啓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現代政治，乃是以關注個人利益與野心的理性男人，作爲其理論與實踐的預設。[73] 可以看到，從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狀態」，到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幾乎所有的現代，特別是自由主義傳統的政治論述，都將一心算計個人利益（通常以權力與財富爲實質）、具有好戰與獨佔欲等雄性特質的個別男人，概念化爲普遍的人，然後想像政治秩序如何發源於這種人的自利需求，又如何使其得到滿足。[74] 在此情形下，人們往往以爲（或

73 Camilla Stivers,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tat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87-88.

74 Joseph Grcic, "Hobbes and Rawls on Political Power," *Etica & Politica/Ethics & Politics* 9:2 (February 2007), pp. 371-392. John Rawls,

者說期待）男子自利的理性，作爲政治行爲唯一重要的原因與制約，能夠從與社會文化脈絡切割的自我(decontextualized, separated self）算計中產生公平正義的政治決定。除此之外，人性中的感情因素則被視爲女性非理性的特質，似乎必然導致不公不義，因此不宜在任何合理的政治狀態中發揮作用。[75]

然而，隨著女性主義的高度發展，越來越多學者挑戰了這種啓蒙男性的政治論述。針對女性政治行爲的實證研究已經證實：不同於男性，許多女性在政治中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某個明確主張或個人權利的增加，而更在乎取得別人的信任與團體整體關係的和諧。[76] 這種缺乏明確自利意識的政治動機或人性需求，在政治過程中，事實上扮演了與自利的理性不相上下，甚至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官僚組織的運作其實依賴大量非理性非正式的資源訊息分享與協調。相對於「剛性政治」所標榜果斷明確、就事論事、依法行政等符合技術理性的行動模式，這種建立在人際情感認同基礎上的互動合作，儘管看來「婆婆媽媽」，卻往往是一切有效行動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因爲如此，國外許多行政機關經常以凡事嚴格遵照理性與制度辦事的「正當」手段，以徹頭徹尾自私理性男人作風，阻絕一切靠親密交流快速解決問題的途徑，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2001).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75 Camilla Stivers,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tate*, pp.39-40. Alison M. Jaggared,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3), p. 86.

76 Camilla Stivers,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tate*, p. 89.

進而達成「依法」癱瘓業務、罷工抗議的實際效果。也是體認到自私理性男人假設的重大局限，晚近學者紛紛反省了啓蒙以來政治思想中的男性霸權，不再將「女性特質」僅僅視爲男性特質的反面，或一概斥爲父權宰制的產物，而是重新探索女性在政治社會歷史中的實際作用。學者對法國沙龍女主人政治角色的研究，就說明沙龍女主人曾是法國宮廷政治中的重要參與者。現代法國男性將她們逐出公共領域，貶斥她們女性化的政治作風，其實反映了男性自身被王權「閹割」的焦慮與反抗。[77]

就此來看，昌化的婦女訓練，以及整個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就不僅是一個中國史中的課題，也具有世界史的研究價值。如同上文一再指出，無論昌化還是整個中國的婦女工作，都經歷了一個跳脫啓蒙智識女性思維框架，重新發現農村婦女主體能動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最令智識婦工與董中生等人驚歎的，恐怕莫過於農村婦女擁有的「非理性」力量。所以稱這種力量是非理性的，自然不是因爲農村婦女毫無思考算計的能力，而是因其難以用啓蒙男性自私的理性加以揣度。農村婦女無疑有中國農民自私自利的一面，但這並不妨礙她們同時懷有非自利的人性需求，將獲得信任與改善人際關係視爲值得追求的目標。現代政治的自私理性預設及其運作邏輯，其實與農村婦女自私自利的一面頗爲相應。在以自我利益的解放與實現爲主流話語的情境中，她們心中經常有一本比充滿理想主義熱誠的智識婦女更清楚的理性帳。因此無論智識婦女宣揚的現代政治與女權理想如何天花

77 J. B. Landesf,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亂墜，自私理性都會讓農村婦女清醒得出結論：在強敵壓迫下，窮困的中國政府給不了她們太多實質的好處。一旦被解放，做了「娜拉」，只怕現代政治的應許之地還在虛無縹緲間，眼前一點安頓身家的盼望已先灰飛煙滅。這就產生了一個弔詭的迴圈：爲自私理性驅動的進步解放政治動能，又不斷爲其自身強調的自私理性所消解。近年來，研究中共農村動員的學者也發現，過往那種農民得到土地實益，因此對中共感恩戴德的歷史敘述，其實過度簡化了農民的行動邏輯與共產黨動員工作的複雜細膩。以國共內戰中的兵源補充爲例：老區農民分得土地後，往往更不願意參軍支前，只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解放軍更加歡迎被俘的國軍士兵。這些僅受過幾天、甚至幾小時政治鼓動的前國民黨士兵，反而表現出更爲可靠的戰鬥力與紀律。[78] 上述發現表明，除了解放論述及其理性人預設，中共顯然還掌握其他「非理性」的政治能力，方能轉化小農的自私傾向爲沛然莫之能禦的眞正解放力量。而這種「非理性」政治能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就在於對農村婦女人性的掌握與調動。如同叢小平對邊區婚姻與婦女解放實踐的新著所顯示：農村中一種「社會母親」的角色，實際上發揮了協調激進解放論述與農村婦女人情需求的重要功能。參酌本文的發現，筆者以爲，「社會母親」的作用其實更爲廣泛。她是傳統父母官理念中母親的一面，只是如叢小平所分析，等到五四一代智識婦女成爲人妻人母時，有了對政治與人生更切實的體會，中國政治中的

78 王奇生，〈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0（2015 年 12 月），頁 192-193。

母性才被重新發現。[79] 或者說，母性的政治行動者也不局限於智識婦女之中，甚至不是女性的專利。董中生的經歷雖然特殊，卻也絕非孤證。能夠在心智與實踐中克服啓蒙男性偏狹思維的大丈夫，其實始終存在，只不過隱身在追求進步的視角之外。

如此再看由母性思維維持的政治秩序中，政治又豈止於理性節制科層管理，更在達致「以和爲貴」的境界。就如昌化老娘所展示，中華婦女以其「不可理喻」的力量，超越了西方現代性的理論預設，從而爲反思更具普遍意義的政治與人性本質，指明前行的方向。

79 Xiaoping Cong, *Marriage, Law and Gend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浙江省檔案館藏檔案

〈浙西行署天南視察組關於巡視戰鬥中的「天南」報告〉，檔號 L029-001-0985。

〈昌化、建德、開化、富陽縣政府二十八年度工作報告〉，檔號 L029-001-0933。

〈於潛、昌化、安吉縣政府工作報告〉，檔號 L029-001-0956。

〈浙江省第一區行署春季視察報告〉，檔號 L029-001-0986。

〈昌化經濟、天北政治得失評判、學術的誕生、天北民眾抗戰史略〉，檔號 L033-001-0627。

〈浙江政情報告〉，檔號 L033-001-0637。

〈提案擴充冬作物栽種面積辦法大綱並經費預算〉，檔號 L033-002-0060。

〈昌化縣冬作物〉，檔號 L033-002-0046。

〈浙西行署行政談話會會議卷（各種經濟問題報告）〉，檔號 L041-000-0014。

〈僞浙西行署地方幹部訓練計畫報告〉，檔號 L041-000-0055。

二、報刊

《女聲》（上海），1943。

《天目》（浙江），1939。

《立報》（上海），1937。

《服務》（重慶），1939、1942、1943。

《東方雜誌》復刊（台北），1977。

《社會日報》（上海）， 1945。
《社會行政季刊》（四川），1944。
《政工生活》（浙江），1939。
《政治知識》（江西），1943。
《時事類編》特刊（重慶），1939。
《浙江婦女》（浙江），1939、1940、1942。
《特教通訊》（浙江），1943。
《婦女生活》（重慶），1940。
《湖南婦女》（湖南），1940。
《進修》（浙江），1939。
《新政週刊》（廣東），1938。
《福爾摩斯》（上海），1935。
《廣東婦女》（廣東），1942。

三、專書

教育部民眾讀物編審委員，《戰時的婦女》。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1938。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輯 14。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董中生，《董中生先生全集・上冊・浮生四記》。臺北：作者自印，1999。

董中生，《董中生先生全集・中冊・戰時縣政》。臺北：作者自印，1999。

Amin, Samir. *Eurocentrism: Modernity, Religion,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 Trans. by 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ng, Xiaoping. *Marriage, Law and Gend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Gray, John.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Jaggared, Alison M.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3.

Landes, J. B.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 Danke.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Rawls, John.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2001

Shi, Xia. *At Home in the World: Women and Char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Stivers, Camilla.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tat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Wolfand, Arthur.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四、論文

毛森，〈往事追憶——毛森回憶錄（四）〉，《傳記文學》，卷 75 期 5，1999 年 11 月，頁 117-126。

徐崖松，〈董中生在昌化二三事〉，《東陽文史資料選輯》，輯 4，1987 年。

王奇生，〈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0，2015 年 12 月，頁 185-194。

宋青紅，〈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婦女部之設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05-156。

柯惠鈴，〈抗戰初期的知識女青年下鄉——以江西爲例的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33-73。

桂華，〈「他者」眼光下的中國——評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文化縱橫》期 6，2014 年 12 月，頁 104-109。

游鑑明，〈交錯在動員與運動間的中國婦運〉，《婦研縱橫》，期 95，2011 年 10 月，頁 6-18。

董慧，〈抗戰動員視野下女性主體意識的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Grcic, Joseph. "Hobbes and Rawls on Political Power," *Etica & Politica/Ethics & Politics* 9:2, February 2007, pp. 371-392.

Lizado, Omar. "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Bourdieu's Habitu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4:4, December 2004, pp. 375-401.

Rethinking the "Man of Reason" in Modern Politic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Women's Work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en-cheng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man of reason" in modern politic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women's train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Changhua County, Zhejiang.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discourse of intellectual women, rural women could not be well-mobilized until they had been emancipated from the "semi-feudal" society. In actual practice, this conception itself made the training difficult because of its poor understanding of rural women's potential and real needs. Only when those cadres began to appreciate the gender identity of rural women, was significant progress made.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women's training in Changhua County, which inevitabl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departed from the discourse of emancip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ese women's so-called "irrationality," compared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man of reason," has greater applicability in world history and modern politics.

Keywords: intellectual women, rural women, emancipation, man of reason, irrationality